

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
Fangtang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
Fangtang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什么是好的 文科研究

WHAT CHARACTERIZES GOOD
HUMANITIES RESEARCH

2025年10月



序言

2025 年 4 月，方塘研究院举行了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的颁奖仪式。仪式轻快而紧凑，更多的时间留给获奖的年轻学者。他们分享了论文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和突破，随后和前辈学者共同探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科论文”。



对本质问题的好奇和对独立思考的坚持，是方塘研究院最先确认的精神气质。

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成立以来，得到众多学者和朋友的关注，也收到了许多真诚的追问：

文科衰落的说法不绝于耳，方塘研究院为何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已是不争的显学，方塘研究院为何不烧“热灶”，而是鼓励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方塘研究院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坚持的审美是怎样的？寻找的学者具备怎样的共同特质？

方塘研究基金捐赠人杨锦方在这次活动上，首次讲述了方塘研究院的使命、愿景和期望。他还谈及了方塘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关系——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并非必然预示人文社会科学的衰落，反而因为新问题的产生，给人文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而抓住机遇的前提，是有前瞻性，是找到本质性的问题，是敢于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冯金红，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在这场活动上，讨论了“在 AI 新时代如何进行创新研究”“什么是好的文科博士论文”“如何进行文科学术研究”等问题。这些话题共同指向一个关于审美的追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文科论文？**沿着这个问题继续追问，我们面对的问题则是，**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这是一个绝对开放、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

这些问题的价值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冲淡，反而更应该被重视，被思考，被讨论，被记录。

杨锦方

清华大学方塘研究基金捐赠人、管委会委员

找到好问题好角度在 AI 时代格外重要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呼啸而来。我们正站在人类文明新的分水岭，期待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的、很可能是又一个轴心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已经推动着人类进入又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大时代。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 AI 对社会的渗透率快速上升，AI 的聪明程度让社会陷入普遍焦虑、人类现有工作被大规模取代、智能体和机器人深入人类社会成为人类新的照护者、朋友和伴侣等现象的普及、AI 增强人、数字永生等现象的涌现，哲学、宗教、伦理等人文问题会再次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杨锦方认为，AI 时代到来后，现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被颠覆。整个人文领域将涌现出许多新问题，等待年轻的学者们去回答。年轻学者要主动对抗工具理性对学术研究的异化，找到好问题，好角度。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大家会追问何以为人，何为生命，何为死亡、意义、爱、友谊等等。**基本的概念被颠覆、基础的哲学理念被重构，而这同时意味着现有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基础的颠覆。整个人文领域将涌现出许多新问题，等待年轻的学者们去回答。**

这些问题虽然宏大，但却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能够引发普遍性共鸣的发问，这些问题也因其本质性，而天然地具有时空的穿透力。

在这样的大时代面前，作为中国人，我们既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赛道上的主要参与者，更应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回应时代之问的同时，也提出更具前瞻性的问题，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的智慧——这也是 AI 时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无论是基础科学发现、重大的工具和方法发明还是应用范式的变革——中国人的贡献与我们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实力严重不相称。

原始创新的元理论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方塘研究院团队讨论了一项使命，要探索和传播培育世界一流创新人才、诞生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思想前提、文化机理和教育规律。**这是一个人文和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希望方塘研究院在追求这个使命的过程中，培育出一批人文和科学交叉领域的大师级学者，孕育出一批人文和科学交叉领域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的经典著作，改变今天全世界学习阅读的经典著作中中国人的作品寥寥无几的局面。

面对工具理性对学术研究的异化，**面对 AI 在知识整合层面的超强能力，当代的青年学者们更要学会找到好问题，找到好角度，借助 AI 的力量来创造出 AI 无法创造的理论。**也正是为了鼓励原创思想的探索，方塘研究院设立了方塘博士论文奖，激发青年学者追求学术前沿、超越知识边界的勇气，以源源不断的思想活水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和社会革新提供人文精神的指引。

在此，我也呼吁更多的青年学者们进行跨学科学习与交流，勇于向基础性、本质性、前瞻性的问题发起挑战，共同守护这方思想净水——使其既保有苏格拉底“助产术”的追问精神，又具备庄子“庖丁解牛”的实践智慧，在与智慧源头的永恒的对话中滋养文明的根系。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奖评委



赵冬梅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她认为创新者不能人云亦云，要耐得住寂寞。而有耐心的前提是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有信心，对跨学科的议题有好奇心，对问题的研究追求完整性。

好的论文要给世界贡献新东西

刚才我重温了当时阅读这些博士论文时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好的文章是让你兴奋的，因为它有新的东西，而且表达是顺畅的。**好的论文一定是要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它是能够给人启发的。我相信科研唯一的目的就是创新，我们要贡献一些新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首先，我们要对当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方塘博士论文奖评审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发生，Deepseek 出现了。AI 嚷嚷了半天，好像真来了。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是在新时代当中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的是数据库的时代，从前那些非常难获得的史料开始数据化。找到几个关键词，然后一设置，很多条材料就出来了，你简单梳理，顿时就获得了比前辈学者更多的材料。那么在这个数据库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读史料？我觉得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你要回到文本本身。一句话，一个词回到文本本身还不够，你还要回到文本的生产环境，去追寻文本的流转路径，然后你才能对来到你面前的文本获得确解，你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大量的深入阅读。数据库时代是史料细读的时代。

现在 AI 又来了，我也恐慌过几天。然后我跟 AI 进行了一些对话，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逐渐缓解了焦虑。我现在的感受是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研究助手。我们现在所有的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都有一个很详实的综述。AI 可以使我们的综述更高效。在此基础之上，创新的工作是我们人脑去做的。

除了技术条件之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创新者需要足够的自信，因为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前所未有，人所未见的。

所以真正的创新在起初不被看好，得不到充分的理解，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它从一开始就能够被大家广泛接受，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原始创新的时代，有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但我们觉得可能朝那个方向走的努力在做，并且继续要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创新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你所创的新，逐渐成型，然后向世人展示。

在这个过程当中，创新者要耐得住寂寞，要能够努力去做完整的工作。

王安石曾经说过一句话，“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

时代怎么样，大家都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有你觉得什么是对的，然后你就往前走才是君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创新者是真正的君子，创新者需要自信，创新者也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

“己然而然”不是刚愎自用，创新者应是最开放的。这种开放首先是面向现实世界的开放，不管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问题的来源一定是现实，所以对于现实世界我们应当保持好奇，保持关注，保持对话的能力，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开放是面向现实世界的开放，同时也是面向其他学科，也就是非本专业非本领域的开放。

学科的分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深入某些细分领域，但是不是为了隔阂。**归根结底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的对象，增加我们对于世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其他学科保持好奇，真正的学者一定是好奇的，并且有持续不断的学习能力，有包容的胸怀。

冯金红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奖评委

学问为己，有真困惑才会有真思想

我是一个职业出版人，其实是没有能力对这么多专业的研究做一些学术判断的。但是我做了 30 年的学术出版，我们三联的学术出版恰恰又是在出版领域比较追求前沿性问题，追求建立在专业研究基础之上的一些跨学科的视野。所以我对人文领域最新的研究，尤其是青年学人的思想动态，充满了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

我们三联书店其实跟博士论文和青年学者这些概念是有深度关联的，因为我们长期致力于原创学术的出版，有一套很著名的丛书，也许大家都听说过，叫“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 94 年创办的，到去年是正好 30 年。我们这套书 30 年积累下来已经有 100 多位作者了，从 40 年代的学人到 90 年代的学人，绝大部分都是现在学术界的翘楚了。这套书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作者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的，而且最后都成为了他们各自的学术代表作。

所以说这个博士论文对一个学者到底有多重要？

杜维明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在美国一个大学教授，一般来讲他一生会出两本学术著作：一本是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另外一本就是由副教授升教授的时候，他的一个成果，能够写出三本书的是特例。

那么杜先生这句话其实是隐含着几个意思，我是尝试着来做一点点引申，**第一层意思是说学者的学术成果不能以数量来衡量。一个学**

冯金红作为有 30 年学术出版经验的资深编辑，提到了年轻学者将自己的学术论文变成学术专著的过程，是从学生到学者的蜕变过程，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从“学术八股”中挣扎出来，做到学问为己。有真困惑才会有真学问真思想。同时也需要心中有读者，有对话的人，有争辩、超越乃至批判的对象。这样，作品才会有问题、有论证、有突破，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充分地发扬。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者，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一生真正有原创性学术贡献的著作真的不是很多，其中博士论文是一个人他在脑力精力和进取心最旺盛时期的思想结晶，所以博士论文应该是生机勃勃的，而且是最富有原创力和突破性的。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我刚才说过我们哈佛燕京丛书的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就是源自作者的博士论文，这是第一层含义。

那么第二层含义我是特别想讲一下，**从博士论文到学术专著，或者说是一个博士生到一个学者，中间还是要经过一段非常辛苦的锻造历程的。**

美国有一个叫莱昂纳多·卡苏托的人，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就叫《它是一本博士论文而不是书》（It's a Dissertation, Not a Book），主要探讨博士论文与学术专著的差异，是强调博士论文的核心目标是学术认可，而不是直接出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博士论文起码在形式上有程式化和标准化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必须“穿靴戴帽”，要符合学术规范，这就会导致很多的论文其实非常小心翼翼，循规蹈矩，甚至沦为学术八股。

我在出版圈看过太多的论文，包括出的这些书。我们现在大量的学术出版，其实是学术生产，它是一种体制内的循环，是没有读者的，甚至同行都不会看。所以从博士论文到真正高品质的学术专著，意味着进阶和蜕变。作者一方面要释放自我，把原创性的力量从专业学术的规范中挣脱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做到心中有读者，有对话的人，有争辩、超越乃至批判的对象，这样的作品它才真的叫有问题、有论证、有突破，然后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充分地发扬，一本活泼泼的、有生命力的著作才会诞生。

我们“哈佛燕京丛书”如果是从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话，一般都会经历至少一年的修改时间，有的会好几年。作者在修改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地从学生修炼成学者，进步是巨大的。

孔子在《论语》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最后衷心地希望，**无论是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在论文的基础上进阶为专著，大家都能做到学问为己，有真困惑才会有真学问、真思想，也才能真正的被学术界、被广大读者认可。**

黄德宽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奖获奖学者石从斌博士论文导师

好论文要把握“变与不变”

这次会议举办者专门提醒我说，黄老师能不能讲一讲，您认为什么样的论文是好论文？怎么促成这样的好论文的出现？这个题目算是给我一个命题。

其实，作为我们人文学科来说，什么叫好论文？古人讲“文无定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且文科是一个多学科组成的大的集合性概念，如果我们细分可以分出很多的学科门类，而每一个学科内部都有很多的学科领域和方向。

文科论文写作各有千秋，研究背景的不同，研究对象、条件、手段和方法都处于变化之中，但在变化之中也蕴含着不变。**我觉得要写好一篇优秀的人文学科博士论文，应该是适应变而把握不变，这“变”就是创新，“不变”就是它的基本规则。**

一篇优秀的人文学科博士论文，首要的就是材料功夫，即研究材料的搜集、挖掘和辨析甄别的功夫。材料是产生一篇好论文的基石。从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来看，新材料的发现和已有材料的挖掘辨析所带来的学科创新，对人文学科来说是非常明显的。百年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甲骨文、西陲汉晋简、敦煌经卷以及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些新材

黄德宽认为好的论文和好的学者都应该在适应变化的同时把握不变，变的是创新，不变的就是学术的准则。而具体的做法，他提出了三点，概括为“材料的功夫”，“问题的意识”和“对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的追求”。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料带来一系列人文学术创新成果的问世。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是以新的学术理念，通过对旧材料的重新审视和辨析甄别，进而提出“中国古史的层累说”，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根据战国秦汉简帛新材料的大量发现，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估中国古代文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同样，根据新材料，裘锡圭先生提出“重建中国古典学”。这些都是从材料入手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进学术的进展。

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首先就要把材料基础打好，真正的材料发掘，数据库只是一个助手而已，如果没有对材料的甄别能力，就无法确定有用的“史料”或“语料”，难以开展真正科学的研究，论文是做不好的。

当然，有了材料基础，**如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聚焦真正的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是论文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创新的着力点。**我想这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才叫创新呢？我举一个例子，著名古文字学家吴振武教授的博士论文写什么？1980 年代初，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古玺文编》相继出版。吴振武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古玺文编〉校订》。论文对《古玺文编》误释字、未识字订正近千条，多有创新，对战国文字研究影响很大。如果按照现在博士论文的一般要求来衡量，或许认为这样的论文未必好。但是，对古文字研究而言，这篇论文很重要，因为解决了很多疑难字词的考释，而且这些考释意见后来被证明绝大多数都是对的。人文学科论文的创新形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关键是真正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核心的地方。

博士论文的上乘之作，应该在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一篇好的博士论文，要有适当的选题，明确的学术定位，更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追求。**如果论文在理论上能建构一个体系，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这就是上乘之作。作为青年学者，这样的目标大多数人虽一时尚不可及，但要心向往之。**很多优秀学者毕生的学术工作，是在博士论文期间打下学术基础的，沿着博士论文确定的方向，不断地扩充、发展、完善。我认为，如果达不到上乘之作的目标，但博士论文能成为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和基础，这也称得上是一篇好论文。

现在，学科交叉发展如此之快，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深度介入人文学科研究，就连古文字研究也开始引进人工智能技术了。即便如此，我想做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做一个好的人文学者，材料功夫、问题意识和科学的理论方法的追求可能依然是不变的东西。**

蒙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奖获奖学者汪佩洁博士论文导师

好的文科研究要经历三个阶段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包括博士论文，我粗浅地谈一谈体会。文科研究，希望探究人类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好的文科研究，要经历三个阶段。

以我自己一直以来关注低生育率问题为例：在第一个阶段，学者可能会问，如何解决低生育问题，需要多给补贴，延长产假，等等，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这个阶段的文科研究，我叫做解决——通过参数调整，应对问题。

第二个阶段，学者探究这些解决方案背后的道理，比如：为什么当我们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人就会多生呢？这个信念背后的假设是：人的决策是理性的，他做还是不做一件事，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这就是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在其开创的家庭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他认为，是否生育、生育多少，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比较，当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

蒙克提出，好的文科研究，从解决问题，到解释道理，到解放思想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会有一个递进关系。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实现这样的递进，很不容易，需要良好的精神的、物质的、社会的条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就会生。因此，当生育成本太高的时候，人就不会生。于是当我们通过政策提高生育的收益，降低生育的成本时，就能够刺激生育。换言之，这套学说揭示了低生育现象出现、以及如何解决该现象的背后的一番道理，它比第一阶段的解决更深入一步，它属于第二阶段——解释。

然而，任何解释都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文科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恰恰就是质疑和反思这种假设。正如刚刚所说，家庭经济学的解释，它假设了人的生育行为是一种成本和收益权衡的理性决策。但成本收益算计，真是人类生育行为的全部吗？我认为不是，远远不是。人不仅在理性算计，人更在追寻意义。他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织造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当我们在问何种成本收益调控能够刺激人的生育行为时，我们其实是在假设生育的意义对于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我们是如此想生育，只不过太高的成本或太小的收益阻碍了我们这么做。

事实上，这个假设，只在现代性到来之前的前现代社会才成立，在那个时候，生育的意义是集体给的，人作为集体的一员——不管这个集体是宗族、民族还是宗教群体，“我为什么要生”这个问题是他提不出来的，因为一切都被集体赋予的意义所确定了。

然而，在现代性展开、在各种传统集体逐渐松弛、当今社会变得高度个体化的今天，每个人都被迫成为选择和道德的主体。于是，我为什么要做某事——比如，我为什么要生育，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传统集体的松弛，它曾经定义的传统意义，已经不再令人满意。

那么，旧的生育意义在瓦解，而新的生育意义又尚未建立，人们便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生。因此，在我看来，今天低生育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生育遭遇了意义贫困。如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策不着力于重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生育意义，那么生育这件事对于人来说，就没有意义。而对于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别的任何事都显得更有意义。用经济学的话来说，生育的机会成本就会被主人主观定义得非常之高，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多少补贴都不够。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低生育的问题症结在于意义贫困，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之前问错了问题：人不生育，不是因为生育成本高而不敢生，而是因为意义虚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因此，与其纠结于补贴要

给多少，与其局限于人在生育上的理性算计，不如直面真正的痛点问题，那就是生育的意义贫困；不如着手处理真正的挑战，那就是建立生育的现代意义。

于是，从此刻开始，我们才不再困于过去所问的错误问题，而是问出了正确的问题。**问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就是好的文科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它对曾经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假设尤其是问题本身进行了反思，它重新定义了问题，**它让我们不再受错误的问题的困扰和束缚，让我们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换言之，第三个阶段的文科研究，它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它不是解决，也远不止解释，它是解放，它尤其强调通过探究人的意义世界，解放思想，提出新的、正确的问题，而解放思想、探究意义，是 AI 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的，这才是 AI 时代文科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所以，小结一下我今天有幸所做的这个分享：**好的文科研究，从解决，到解释，到解放，会有一个递进关系。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实现这样的递进，很不容易，需要良好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社会的条件。**让我们高兴的是，今天的清华大学文科，以及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正在致力于创造这样的环境：从对学术成果的精神认可、到对于成果的物质奖励、再到学者社会网络的搭建，无不体现着构建一个有助于文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科学者成长和思想进阶的健康生态。所以，**请让我再次祝贺、并感谢各位获奖者，不仅是因为你们的获奖，更是因为你们加入、丰富了这个生态。**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谢谢。

首届方塘创新博士论文奖获奖名单



陈韵青

《秦汉官吏用印研究》



刘禹彤

《以元统天——董仲舒春秋学五始思想研究》



石从斌

《楚简常用词研究》



汪佩洁

《我国现发展阶段企业税费征管问题研究》



郑翌骅

《永乐宫元代彩画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陈韵青

寻找文科研究的 " 想象力 "

任何好的研究，最基本的要求都是“言之有据”。这对文科研究尤其重要，人们或许觉得文科研究偏感性、主观，但真正优秀的文科研究，其理性程度、逻辑性都非常关键。我们史学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传统，这是学科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好的文科研究还需要“想象力”——不是所有人看到同样的材料，都能想到你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注意到不同材料中的关联性，把研究思路梳理、组织成最终的成果。这种想象力还要能打动别人，让读者无论是否熟悉原始材料，都能通过研究的叙事联想到自己关心的问题。如果再往高一层说，好的人文研究应该承担“教化”功能。北大李猛教授曾说：“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我觉得好的文科研究也可以达到类似效果。在科研和生活中，难免会有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刻，与“不被看见”的时期。以毅力广泛搜集资料，以恒心推倒重来、反复搭建框架，以耐心小心求证结论。这样的研究或许能鼓励读者不仅追求高远，也勇于迈出第一步并默默坚持下去，平静地、不预设观众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这种想象力最直接地体现在选题上。好的选题既要符合学科规范，又要有跨学科的关怀。以我自己的印章研究为例，关键的突破在于将视角从“印”转向“用印”，充分利用并整合了简牍中那些被忽视的散落线索，使“人”即用印者们走到台前。回顾自己的选题历程我才意识到，最终的研究角度其实是个人成长经历、阅读积淀和机缘的交织，是无可复制且个人化的东西。而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越是个人化的东西，反而越容易引发共鸣。起初我以为这个视角“只有我想到了”，但在学术交流中却发现它能引发强烈共鸣，让听众觉得“确实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这让我思考，真正的学术创新并非来自有意为之的标新立异，而是源于研究者独特生命体验与学术问题的深度融合。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面对学术生产日益标准化，大家多少都感到对模式化重复的“审美疲劳”。但根植心中的学术审美标准并未降低——我们依然期待令人兴奋的学术著作，和“范式林立”的活跃景象。因此，创新需要承担“速度竞争”和“评价标准”的双重压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自觉地保持提问的状态，不陷入思考的疲惫无力。提问源于好奇，也源于质疑。面对权威，有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理解得不够深入”，而非“我的疑问可能指向新的答案”。我们在潜意识中默认“一个问题对应一个标准答案”，权威给出的必然是正确答案。我的导师曾坦言，他很困惑为什么学生不曾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或“您的史观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习惯于讨论技术细节，却不敢触及更根本的问题，仿佛那样做“太过冒昧”。

这种心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从应试教育的“标准答案”思维，到社会竞争中“完美表现”的追求，都让我们对“暴露无知”心存恐惧。然而，真正的学术进步恰恰需要这种“暴露”——承认自己的困惑，勇敢提出质疑，在思辨中寻找新的可能；以“无知”为起点——那代表“未知”，使“有知”与“新知”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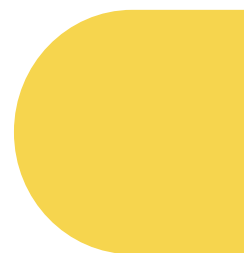
改变这种状况，或许需要从营造更加平等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开始。我深深感激我的导师，他总是真诚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培养我们“日常”的好奇心。这种经历让我相信“提问有价值”，也让我在面对其他前辈时多了一分自信。即将成为教师的我，希望也能为学生创造这样的“小环境”，让他们敢于表达困惑，勇于提出质疑，找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源源不断的未知与新知。

从更高的层面看，优秀的学者往往具备一种跳出具体事件，抽象核心概念，与不同领域对话的理论能力。这种能力的价值不在抽象本身，而在于能够建立跨领域的对话，让具体研究获得更广阔的意义。这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培养的“思维习惯”，要求我们既能深入细节，又能跳出来看到更大的图景。

在探索“好的文科研究”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其实我们都在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想象力”，好的文科研究不应被标准化束缚，而应展现出学者独特的视野与关怀。在这种“非标准”的探索中，我们也在寻找着对话与共鸣，期待能为这个时代贡献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考。

刘禹彤

追问永恒的真问题



在探讨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时，我认为核心在于识别“真问题”。

这并非指个人兴趣或一时风潮，而是那些具有永恒性与严肃性的根本问题。纵观历史，思想家们的追问穿越千年，依然是社会运转的基石，如柏拉图探讨的“正义”。这些问题关乎人的本质、宇宙的秩序等等，在历史的流变中始终存在，构成我们文明史的主线。每一代人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问题本身始终有意义。好的研究，应当锚定这些严肃的、非个人化的真问题。

当下人文学科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很多研究似乎变成“填空题”。填补学术空白固然重要，但有时候空白之所以存在，可能是因为问题本身不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用同样的思维范式反复研究同一个问题，思想一旦定于一尊，就必然走向僵化。真正的突破性研究，恰恰在于能基于时代变迁，对经典人物或思想提出新的、与前人不同的深刻认识。人文学科的发展，绝非简单累积知识，而是每一代人对永恒问题的重新叩问与回应。

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担心，一个超越人类智慧的存在会剥夺我们的自主性，让我们再次被一种更高的力量“规定”。但我观察到，大部分人文学者对此相对冷静，这种冷静也许一定程度上来自人文学科的内在自觉。

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是探讨幽暗复杂的人性，是处理“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非“对”与“错”的科学实证。AI 可以整合知识、梳理逻辑，但它目前还无法深入人性的深处，无法穷尽价值世界里那无数的可能性。AI 的出现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去思考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关于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更非追求标新立异，更多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为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而进行的思想突破。理工科的创新常意味着新发现和新突破，是线性进步的标志；文科创新，源于研究者对真问题的深切关怀和明确意图，服务于对人类文明意义的追问。

当前文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学科制度本身。近一百多年引入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使中国以“经史子集”为框架的传统学问，碎片化地分割到了不同学科。例如经学被分散到不同的现代学科中，丧失了整体性，其中许多研究的创新性变成一种时髦性，比如将我们的现代概念强加于古人，这样的“后见之明”往往产生许多伪问题。我们的人文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在晚清以降的废墟之上，依据西方模式重新建立的，尚未真正扎根于自身文明的土壤，许多基础工作远未完成。人文学科亟需一种“坐冷板凳的自觉”，回归核心问题，守住底线，在深刻理解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与科学对话或应对未来。

做人文研究，尤其是在当下，意味着选择一条清寂的道路。它可能无法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或快速的晋升。支撑很多人文研究者走下去的，是研究本身带来的纯粹的精神愉悦，在阅读、思考、与师友交流中获得的快乐，以及对“理解中国古代文明何以成为今日之形态”等命题的使命感。经学作为塑造中华传统的关键学问，其具体的古代规范可能早已失效，但理解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其实是通向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需要每一代人去认真探求。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包括 AI 带来怎样的冲击，守护和深研这份传统，探寻那些永恒的真问题，始终是人文学者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石丛斌

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做“落地”的学问



学术研究的底层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宏大，甚至有些哲学的命题。以我研究的古文字领域为例，它虽然属于文科，却有着极强的科学属性，对错分明。我们研究古文字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还原历史”，即弄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如何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生活、文化与社会。

虽然我们穷极一生，都在找寻那个无限接近真理的答案，但这条探索之路并非坦途。我也曾反复追问自己：做这些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引出了一个或许许多学人都会面临的核心纠结：做学问，到底是为了当下的生存与功名，还是为了以后能给后人留下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逐渐想明白，人或许都要两条腿走路。现实生活要顾及，这是我们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基础。但作为学者，更要对自己的学术生命有要求，要清醒地分辨哪些研究是“能站得住的精华”，哪些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写的“凑数之作”，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

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我学会了区分“真问题”与“好问题”。“真问题”是学科中悬而未决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它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但极其艰难，甚至穷尽一生也未必有答案。而“好问题”则是那些少有人涉足，且与自身知识储备、能力相匹配，有可能给出圆满解答的问题。在现阶段的研究中，我会优先解决“好问题”，以此积累科研经验。但我的最终理想，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挑战那些真正的大问题，因为那样才可能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当然，无论是解决哪种问题，创新都是关键。当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研究越来越精细化时，就容易陷入瓶颈。此时，打破壁垒、引入新视角就尤为重要。就我从事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而言，将古文字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方法、新工具，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工具永远无法取代人。工具的价值在于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而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连接点”，在于那种无法被数据和代码模拟的复杂思维与灵感。创新，终究是底层逻辑的突破，而非数据量的堆砌。

就我个人而言，支撑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底层动力就是“想留点东西给后人看看”这个简单的念头。经历过无数次迷茫、焦虑、气馁和失败后，我如今的目标变得更为“落地”：就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持续深耕，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人的这一生很短，怎么证明自己存在过？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留下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果，就是一种方式。这种学术研究的底层动力来自对未知的好奇，来自“想弄清事实”的本能——弄清“人从哪里来”，和我们“将往哪里去”。

汪佩洁

在“精致的平庸”之外，寻找一个真问题



最初接触实证研究时，我曾备受震撼。原来文科研究并非“我想故我写”，而是可以如此规范——它的方法、过程、结论皆可验证，像一条标准化的流水线，保证了知识产出的基本质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是这种范式的忠实拥护者，相信严谨的数据和清晰的论证是一切研究的基石。

但慢慢地，我感受到了它的局限。你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拿到什么数据。许多绝佳的创想，因为数据不可得而搁浅。更危险的是，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精致的平庸”：用最前沿的模型、最详实的数据，去论证一个早已人尽皆知的常识。研究看起来无懈可击，却缺少真正的洞见与光辉。

真正的突破，始于寻找到一个“真问题”。

完成博士论文时，我并未体会到这种感觉，那更像是一项必须攻克的任务。直到最近，我才真正找到一个甘愿为之投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间去钻研的问题——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划分。这并非一个凭空杜撰的题目，而是国家治理中一个真实、紧迫且尚未解决的困境。当我开始深入梳理文献与政策，发现这个问题背后盘根错节的逻辑与矛盾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油然而生。我意识到，我的研究或许真的能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一点点数据模拟的视角和智力支持。

那一刻我才明白，所谓“充实而又光辉的研究”，其内核正在于此，它敢于且致力于回应我们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真问题。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文科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它不应被狭隘地等同于量化或可测量。科学精神的本质，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是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田野记录，还是历史学家对故纸堆的考证，只要是忠实地记录、严谨地分析，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而要让研究抵达更深的层次，除了实事求是，我们还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历史纵深感”，对历史背景的理解浅薄，社科研究就容易悬浮于空中；二是将“研究问题”提炼升华为“科学问题”的能力。前者需要我们回望经典，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养分；后者则要求我们挣脱日常经验的束缚，去触碰社会现象背后那个更具普遍性的规律。

学术研究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无形中塑造了我的性格——对凡事追问到底的“较真”，以及对万事万物皆可探究的“好奇心”。我不再把学术目标定得“高大上”，而是希望做一些“入地”的研究。如果未来，当人们谈及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等问题时，会有人说“可以去问问汪佩洁，她对这个领域有研究”，这于我而言，便是最大的满足。我不怕研究“没有水花”，只怕它“没有回响”。哪怕只有一个读者因我的研究而更理解这个世界，或一个政策因我的论证而更合理一点，那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文科研究是一场与真实世界的对话。而我们最好的姿态，是始终保持诚恳、好奇与敬畏。

郑翌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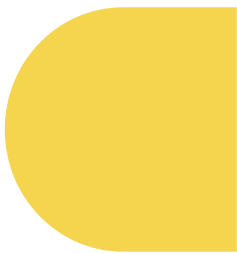
在文理之间——一名跨学科者的观察与思考

我的学术路径有些特殊——从工科转向文科，目前在科学史领域从事博士后研究。这种跨界的经历，让我对研究方法、知识生产与学科差异有了不少切身的体会。

我最初接触系统性的学术训练，是在博士阶段。我的导师深受傅熹年院士影响，强调一种叫做“题签”的文献阅读方法——每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献，不纠结细节，而是提炼其方法层面的核心，用自己看得懂的方式记录下来，就像中药柜里一个个小抽屉，积累多了，便成了个人专属的“问题库”和“思维网络”。这种训练看起来笨，初期也很痛苦，但长期坚持下来，会形成对研究范式自觉的反思能力——我称之为“层次零”的能力。它不是马上能用的技巧，而是一种深层储备，让你在需要时能迅速联想、比较、批判，看出别人框架的来历与局限。

这种方法背后，其实是一种对知识诚恳的态度。我在带学生去山西永乐宫做测绘时，也深有感触。那些本科生的提问常常天马行空：“为什么这个斗拱和书上画的不一样？”这些我习以为常的细节，被他们重新“陌生化”，反而推动我跳出专业惯性和他们一起思考。更让我受触动的是清华“古迹协会”里那些来自其他专业的文博爱好者——有些人已经走遍了千余处国保单位，见识远超于我。他们提醒我：不管做多少研究，本质上仍是初学者。做研究不是闭门造车，提问的能力和向他人学习的开放心态，和阅读文献一样重要。

很多人讨论文科的“有用”与“无用”，但我从工科跨来，反而更敬畏文科的深厚。我的研究涉及古代建筑保护，很多时候，决策依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据并不来自仪器测出的数据，而是来自碑刻、题记、匠作则例这些典型的文科材料。比如历史建筑修缮工程遵循的“最小干预”原则，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依据历史信息，为后代认识、感知我们的文化遗产保留最大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文科思维赋能工程实践。文科在这里不是“虚”的，它切实参与塑造了我们如何理解、保存和传递文明。

在科学史系做博士后的经历让我发现，文理其实是交互共生的，并非割裂。科学史研究中，数学逻辑、理化思想和文科方法结合得非常紧密。出土文献中心研究竹简木简时，需要先用高清摄影、多光谱扫描等科技手段提取字迹，才能进行文科研究。现在不管文理，研究趋势都是“更严谨、更谨慎”，这种“重视实证、避免主观臆断”的思路是文理共通的。

当然，文理学科在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工科论文可以很薄，讲究逻辑闭环、数据支撑，而不强求“普世正确”；文科论文则常倾向于广征博引、层层推演，像写一本书，追求叙述的圆满和立论的稳妥。两者没有高下，但折射出不同的学术审美和风险偏好。对我而言，工科的训练让我习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但也渴望学习文科将复杂内容转化为有吸引力叙述的能力——好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诱人的故事”。

如今 AI 兴起，很多人忧虑它是否会取代人文研究。就我使用体验来看，它目前仍难以深入处理需要高度语境化和批判性思考的学术问题。但我更愿意视它为工具，把我们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更专注于提出好问题、建立新连接。真正的学术创造力，依然来自于人——人的好奇、人的反思、人的坚持。

回望自己的研究历程，最大的收获是“得出结论的瞬间”——不管结论是否完美，那一刻的智力满足感，足以抵消所有过程中的困惑与孤独。至于影响力，年轻时可说“做给自己看就行”，但现在也逐渐理解，成熟学者希望研究成果被看见、被使用，甚至反哺学术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这不是功利，而是学术的社会性一面。

如果说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自己始终保持初学者的心态，在文理之间自由穿行，既不忘工科的清晰与务实，也深怀对人文的敬畏与热爱。学术于我，终归是一场持续的追问，而好的追问，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回答。

关于创新的想法问答

关于博士论文的创作

“

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你认为哪些方法论、思维习惯或者外在的帮助，对于你打开思路有帮助？具体有怎样的帮助？

○ 刘禹彤

我主要研究传统经学，传统经学有一套前现代的方法论，也就是经 - 传 - 注 - 疏的层层解码。简单来说，经就是五经，传是解释五经的文本，注是解释传的文本，疏又是解释注的文本。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路径，简而言之，就是没有空无依傍的学说，有的只是深入理解传统，与更深入地理解传统。

这一套方法论在现代受到极大冲击，最核心的难题其实是现代很多学术概念都翻译或引介自西方，然而，往往与中国传统语汇难以匹配，这容易导致我们与自身文明传统反而产生隔膜，我们必须对传统进行现代的、理论化的阐释，才能有助于真正深入理解传统。

然而，传统经学的理论化阐述，不是一个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过程，比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所研究的“五始”，翻译为现代汉语是“五个开端”，无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问题。因此，我

只能不断回到传统学问经 - 传 - 注 - 疏的解释脉络当中，追溯“五始”两个字更丰富的意义。这样的回溯，没有预设一个学科作为方法论的分野，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主导整个研究。

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跨学科的核心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来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借鉴文史哲众多视角的同时，将重心放在问题和思考的深入程度。**跨学科是近些年的热门方法，但事实上，我们的传统学问原本就没有学科。因此，在人文学科内部，跨学科本身是创新性和复古性的统一。**我的研究的创新性，在我个人看来，恰恰也是研究的复古性，也就是回到文史哲分科之前的经史传统，回到一个文明的源头活水处。

○ 陈韵青

方法论：我的导师侯旭东先生曾不止一次鼓励我们，史学的方法论并不高深。我比较注意从两个方面思考问题。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一是“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黄宗智）。二是“细”。在现阶段学术积累和体量如此宏富的状况下，只有更细地解读史料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思维习惯：**我对于越是权威、越是主流的观点越有所警觉，习惯自己检验、判断。**另一方面，我比较习惯自我反省，对善意的意见与批评接受度很高。

外在的帮助：在导师组织下，**我们有每学期一次的内部讨论会，每人报告近期成果和心得后，要求所有参加者逐一发表意见，务求直率。**我博士论文的每一章节都在讨论会上进行过发表，得到过充分的讨论。

○ 郑翌骅

在博士研究过程中，几个关键方法对我的思路开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是**长期的田野调查**。2017-2023 年间，我对永乐宫及周边案例进行了 8 次系统调研，累计工作时间超过 100 天。这种沉浸式的田野工作让我更真切地理解了全真道人以“象教”为意图修筑永乐宫的用心，也观察到了一些施工记号。这些一手观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我所在的团队一起开发了一套建筑装饰数字化记录方法：1) 采用 360 度全景摄影记录空间关系；2) 使用显微摄影捕捉纹样细节；3) 运用多光谱成像识别底层画稿。这些技术手段帮助我发现了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装饰特征，如彩画中的修改痕迹。

第三是**跨学科的研究协作**。与文物材料检测分析领域专家的合作尤为关键：1) 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分析，首次确认了永乐宫彩画中青金石的使用；

2) 利用显微拉曼光谱发现了正长石伴生矿物的存在；3) 通过伴生矿定位法分析推测了部分矿料的来源。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极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是**文献的系统梳理**。我整理了包括《道藏》相关典籍、元代碑刻题记、明清修缮档案等在内的 200 余份文献，建立了完整的研究资料库。特别是对永乐宫现存碑刻的逐字校录，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这些方法相互支撑、互为验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例如，将碑刻记载的修缮年代与彩画层检测结果对照，可以准确判断各时期装饰的特征演变。这种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是突破传统研究局限的关键所在。

○ 汪佩洁

系统协同的视角对我很有帮助。社会科学旨在发现社会现象中的规律，而规律建立在事物之间的联系基础之上。因此系统协同视角可以给我一个“普遍联系”的思维，使我不时跳出研究对象本身，从整体的视角、互动的视角去理解单一现象。

例如，研究企业税费征管问题，看似是企业行为，但利用系统协同的视角，一定会考虑到政府 - 市场关系，中央 - 地方关系，等等，换言之，这使我明白企业税费征管问题绝不是一个微观的企业现象，而是涉及到多层级政府、多部门互动的一个结果。

○ 石丛斌

方法论上：二重证据法的帮助最大。思维习惯上：反向思维影响最大。外在帮助：和师友的及时沟通。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关于创新的想法问答

关于如何做到理论创新

“

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认为是否有方式方法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个困难？

○ 刘禹彤

我的研究对象是董仲舒，在董仲舒的时代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分科，然而在文史哲的分科研究中，文学可能重视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史学更重视董仲舒和独尊儒术的关系，哲学更重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学说。每个角度的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但这些不同的碎片，如何进行统一？如何能真正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董仲舒？这是我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遇到的最大困难。**

这个困难最终不是完全靠自己闭门造车来解决。往往我们会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像理工科一样需要进行团体协作，但事实上，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依然非常必要。尤其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陈壁生老师和硕士导师娄林老师，我分别在两位老师开设的读书班上和师友共同阅读了《春秋》学原典。课程上主要收获的是一些学科的通论和常识，但在读书班上往往能收获更加独特的认识，因为经典的阅读要求深入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在抛开一切成见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论文的很多想法都是在深入阅读交流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

○ 陈韵青

坦白说，**最大的困难似乎在于不知道研究到了哪个层次算达到了理论创新，甚至对真正的理论是什么都不明确。**我虽然向往理论建构，但也很难确定地举出哪些古代史领域的研究达到了理论创新。我们有时会评价某位学者的研究理论性强，但那是否就是理论创新呢？

内在解法：**思考力的锻炼和身体锻炼相似，可以通过锻炼提升、突破本来的极限，回到源头，多啃几本哲学经典对我个人就是锻炼的方法之一。**

外部帮助：研究生写论文多从模仿开始，**或许可以广泛征求推荐意见后形成具有理论创新意味的著述列表，供大家参考、领会。**

○ 郑翌骅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及其解决方案如下：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最大的挑战是史料的碎片化。元代建筑装饰制度的直接记载极为有限，现存实物也多有残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发展出“三重互证”的研究方法：1) 文献互证：将多方永乐宫相关碑刻内容与《道藏》相关记载交叉验证；2) 实物互证：比对永乐宫、龙山石窟、清虚观等同期案例；3) 技术互证：通过材料分析补充历史信息。

第二个困难是研究范式的局限。传统建筑史研究多关注形制和年代，对单一案例的装饰研究较少。我的突破在于：1) 挖掘并梳理了一些与道教思想相关的纹样母题流变历程；2) 将装饰研究与建筑的空间及功能关联了起来；3) 建立“图像-工艺-空间”三维分析框架。

针对这些困难，**我认为最有效的解决路径是：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方法开放、注重实证基础。具体到我的研究，每当遇到解释困境时，都会回到三个基本问题：**1) 实物证据是什么？2) 技术分析支持什么？3) 历史语境如何理解？这种研究思路帮助我克服了多个理论瓶颈。

○ 汪佩洁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创新的“想象力”。每次我欣然以为找到了一个小的理论突破或创新点时，**查阅文献总能找到类似的研究，这种挫败感让我感觉到创新的想象力实在来之不易。**

人无法说出他没听过的话，所以理论创新也一定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的，这使得理论创新天然具有创新性和继承性之间的悖论，如何在继承性之上寻找创新性，考验的就是基于学科知识的逻辑自治的“想象力”。

对我来说可能的解法是深入田野，以及同身边的师友聊天。**基本上我见一个人就会讲一遍我的研**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关于创新的想法问答

关于文科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

你如何看待文科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你认为逻辑一致性对于文科研究来说重要吗？如何发挥作用？

○ 刘禹彤

近代革命以降，文科研究已经自觉向科学精神靠拢。比如胡适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范式，将清代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结合，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态度处理文史问题。胡适认为传统学者只是“故纸堆里翻筋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胡适等现代学者打破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权威。在科学精神的洗礼下，人文学科焕然一新。

近年以来，AI 的发展又给人文学科带来了冲击，然而，AI 可以解析文史哲作品的逻辑结构，但难以真正体会人之为人的复杂情感和终极困惑，人性的奥秘是人类几千年来都无法找到最佳答案的问题。人文学科面对的往往是难以量化的人性困惑本身。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不是一个关乎理性和逻辑的问题，而是人本身的价值所在。

文科研究离不开科学精神，但并不是在绝对依赖意义上的“离不开”，而是在科学可以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更多便利的意义上“离不开”。

文科研究需要坚持逻辑一致性原则，然而也应该意识到，合乎逻辑不意味一定合乎义理，比如西方文明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合乎西方的逻辑一致性，但由于这套逻辑没有在古代中国文明中得到接受与实践，因此不合乎中国文明的义理需求。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在心理上能够互相理解，但不意味着遵循同一套逻辑。文科的特色在于多元性，追求一个具有逻辑唯一性的答案，或者说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答案，往往会扼杀文科的生命力。

○ 陈韵青

就博士论文或科研写作而论，文科研究具有科学精神，逻辑一致性亦是其论证具有说服力的基础。不过我曾听过最动人的一种观点是：“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李猛）什么是“好人”？“难且值得”具体指什么？这些都不是科学精神和逻辑一致性可以论证、解决的问题。在将文科研究转化为教育或面向科研之外的宣传等其他形式时，理解、阐释与开放等变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为了目标。不过教育与任何转化形式首先都需要保证研究基础真实可信。

○ 郑翌骅

在我的建筑史研究中，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实证原则的贯彻。所有研究结论都建立在可验证的证据基础上：1）建筑实物测绘数据；2）文献档案记载；3）科学检测结果。例如，关于永乐宫彩画年代的分期研究，不仅依据样式分析，更有彩画样品的剖面显微观察结果支持，每个结论都有明确的证据链。

其次是研究过程的规范性。我建立了严格的工作流程：1）田野调查标准化记录；2）实验分析可重复操作；3）数据处理透明公开。以色彩研究为例，使用同一型号的识色仪，按照统一标准测量，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第三是逻辑的一致性。整个研究构建了完整的论证体系：1）从微观的纹样分析到宏观的风格演变；2）从技术特征到文化内涵；3）从个案研究到普遍规律。例如，对“云气纹”的研究，既分析其构图特征，又探讨其宗教含义，最后再将其置于元代艺术发展脉络中进一步阐释。

科学精神还体现在对研究局限的坦诚面对。在论文中明确说明：1）样本的局限性（如部分彩画已不可见）；2）检测技术的误差范围；3）解释的不确定性。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

我认为，文科研究要真正体现科学精神，必须做到：1）以证据而非观点立论；2）保持方法论的自觉；3）接受同行质疑和检验。

○ 汪佩洁

文科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应该就是“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

逻辑一致性对文科研究非常重要，这可能是我做社会科学的方法训练的惯性思维所导致的。至于如何发挥作用，我认为**逻辑一致性在社科研究中可以“翻译”为进行谨慎的因果推断。**

当然，因为文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很多现象超出逻辑理解范围，成为了某种“不可知”。应对不可知，可能是文科研究在解决了因果推断之后的下一个重要命题。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关于创新的看法问答

关于如何提出好问题

“

很多学生和青年学者面对无法提出好问题的困境。你认为怎样的训练可以激发提问的热情？提问是一种习惯吗？可以被训练吗？如何训练？

○ 刘禹彤

一般可能认为中式教育下的学生善于被动接受，不善于主动创造。每个人理解的“好问题”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个人认为，“好问题”首先意味着“真问题”，真问题必然涉及每个时代最根本的追问，因此，每个时代的“好问题”极其有限。提不出好问题，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我们很难单纯通过训练来使一个人提出好问题。

真正的思想命题比如柏拉图洞穴隐喻、海德格爾的存在之问等等，在人类精神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史坐标系中的“真问题”永远与时代精神保持张力，既根植于特定历史情境，又指向超越性的终极关怀。

人文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思想问题，真正的思想问题可以穿越时空走在每代人面前。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或许不在于提不出更多“好问题”，而

是给不出“好回答”。当现代方法论迷信笼罩人文学科，当我们试图依靠方法论批量生产研究者，可能遗忘了传统思想火种的传递，依赖师生和同道之间朴素的生命碰撞与精神共振。

○ 陈韵青

关于什么是“好问题”，不同语境下会有新的、多样的定义。但的确，在我的观察与个人经历中，也发现中国学生的性情不习惯“提问”，尤其是在公开场合提问。不过这里还有一重区别，是心中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却不喜欢说出口，但愿私下交流或诉诸文字等。我想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更多地落在“心中没有问题”，又只能通过是否开口提问来判断心中是否有疑问。

开口提问只是一种行为选择，提问本身则是一种思维习惯，这或许就是培养好奇心。在训练时可以鼓励各种方式的提问，开口提问、笔下提问，公开提问、私下提问，提大问题、提小问题，等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等都被鼓励，有正向反馈能从心理上使大家爱上提问。先把“好问题”的标准放宽，或许也能减轻对提问的心理压力，不必担心问出的问题不够“好”而扼杀提问的冲动。

○ 郑翌骅

基于我的研究经验，提出以下培养提问能力的建议：

第一，建立系统性训练方法：

1) “三问法”训练：对每个观察现象提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层次的问题。在永乐宫调研时，这种方法帮助我发现了很多深层问题，如不同殿宇的彩画差异不仅在于样式，更反映了功能需求。

2) 文献批判阅读：我希望自己在阅读经典论文时，必须找出至少三个可以深化或质疑的点。这种方法培养了我的批判性思维，例如对传统分期观点提出新的证据。

3) 跨学科问题转换：将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引入本领域。如将材料科学的“工艺溯源”问题转化为建筑史的“技术传播”研究，拓展了提问的广度。

第二，创造有利于提问的环境：

1) 为自己营造跨学科研讨的学术氛围，与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积极沟通和交流，互相激发问题意识。在与材料学、考古学领域相关学者的交流中，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

2) 建立“问题日志”，记录研究过程中的所有疑问。我的调研笔记中专门设有“待解问题”栏目，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后续研究的起点。

什么是好的文科研究

3) 实施“问题答辩”，定期就提出的问题和同行进行专题讨论。

第三，培养提问的思维习惯：

1) 保持“初学者心态”：每次调研都当作第一次接触，避免思维定式。

2) 建立“问题网络”：将零散问题系统化，形成问题之间的关联。我的研究笔记采用思维导图形式，直观展现问题的逻辑联系。

3) 实践“苏格拉底式追问”：对每个初步答案进行连续追问。在研究彩画功能时，通过连续追问“为什么这样设计”“为谁设计”“如何被感知”等问题，最终触及宗教体验的核心。

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将提问从自发行为转变为自觉能力，从零散想法发展为系统思维。我的研究实践证明，好的问题往往比答案更能推动学术进步。

○ 石丛斌

小朋友有“十万个为什么”，是一种基于本能和常识的提问，无需训练。然而人越长大，提问的本能却逐渐消退，这是一种“对经验世界的麻木”。如果我们能用一双“纯粹”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或许就能提出好且有趣的问题。

提问不是一种习惯，质疑才是真正的动力。有质疑、有疑问，也不一定会提出，这是源于我们传统文化尊师重道、谦卑等因素的影响。不过即使不提问，内心也可以带着疑问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文字撰写 | 马圣涵

编辑 | 张慧

指导单位 | 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

设计 | 良田在

